

第一篇

军事与经济互动背景

-
-
- 第一章 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
- 第一节 军事需求与供给的内涵
- 第二节 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的特殊性
- 第三节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
- 第四节 中国军事需求与供给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
- 第二章 新的战争威胁
- 第一节 战争形态演变
- 第二节 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
-
-
-

第一章 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

巨大的军事需求与有限的经济供给之间的矛盾，是军事与经济相互依存、相驱发展的基本矛盾状态。深入分析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的产生及其特殊性，以及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供需的影响，揭示军事供需矛盾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是进行军事与经济互动问题研究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基础。

第一节 军事需求与供给的内涵

军事需求与供给，是指国家和军队为准备战争和支持战争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与提供的资源保障。在和平时期，主要表现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在战争时期，主要表现为战争消耗、保障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

军事需求与供给的基本要素包括军事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力等各方面的需求与供给。其中，军事财力（军费）是其他诸种需求与供给要素的价值表现。现代社会的军事需求与供给都是以军费支付能力为保证的需求与供给。因此，军事需求与供给通常首先和集中表现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对国家财政提出的军费需求与供给。

军事需求与供给，在实物构成上，可分为军事消费需求与供给

和军事投资需求与供给两个层次。军事消费需求与供给，是以军用消费品和服务为对象的一种军事最终需求与供给，包括军人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各种生活用品的消费需求与供给，军队作战和训练所用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费需求与供给，军队营区、训练场、军事基地、军用仓库、军用交通和通信设施等各种军事设施的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相关的军事服务性劳动的消费需求与供给。军事投资需求与供给，则是由军事消费需求的发展而引起的一种派生需求与供给，它是以军用生产资料等投资为主要对象的军事间接需求与供给，包括在军事工业等军品生产领域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资料需求与供给，以及在军事科技、国防教育等领域投资所形成的物质条件需求与供给。

军事需求与供给的规模、结构和水平的确定与变化，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军事战略。一国军事战略的重大调整，必将带来该国军费开支规模、军工结构和规模、常备军的数量和结构以及武器装备水平等各方面需求与供给的全面调整。然而，各国军事战略的确定和调整，又直接反映建立在一定经济和科技基础上的战争实践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

第二节 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的特殊性

一、军事产品的特殊性决定军事与经济供需矛盾的特殊性

所谓军事产品，是指对军事要素的有效整合及其运用而产生的有形物和无形物共同构成的一种价值形态的特殊产品，即国家安全（和平）。国家安全（和平）是一种公共商品。根据消费性质和特征，西方经济学将社会为居民提供的最终消费品划分为私人商品（pri-

vate goods) 和公共商品 public goods) 两大类。公共商品 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大基本特征 因此 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导致任何其他人消费的减少。据此 国家安全 (和平) 是一种典型的纯公共商品。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商品是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大基本因素。国家安全（和平）作为一种公共商品，它不仅符合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概念要求，而且也具有一般商品的基本属性。首先，国家安全（和平）是军事劳动者辛勤劳动的产物，军事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其次，国家安全（和平）可以用来交换，因为军事劳动者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必须通过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来获得自身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再次，国家安全（和平）这一最终产品通过交换可以向全社会提供国家安全 和平 福利 促进全社会的稳定发展 可以满足人类社会的某种具体的安全需要，因此国家安全（和平）具有使用价值。最后 国家安全 (和平) 商品 凝结了军事劳动者的一般的无差别的劳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但是，军事产品与民用产品相比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

（一）产品特殊

国家安全（和平）是军事终极产品。在产出军事终极产品过程中，又有一系列中间产品产出，如武器装备、战场设施、军需物资、训练有素的作战人员等。中间产品又分为军工产品和非军工产品。军工产品是军工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品，非军工产品是由武装力量及军工企业以外的各有关部门创造的军事产品。与民用产品相比较，军事产品的产出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体的双重性。民用产品的产出主体一般为企业。但是，军事产品的产出主体则既表现为企业，也表现为武

装力量。军工企业是军事产品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生产运行的基本细胞。但军工产品一般只有通过武装力量的使用，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武装力量也是军事产品运行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产品的特殊性。军事产品是一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产品。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它不是用来直接满足社会的一般消费需求，而是用来满足保障国家对军事安全（和平）的需要。因此，军事是一支生产国家安全（和平）的生产力量。在和平时期，国家安全（和平）是通过军事的存在及武装力量的战争准备和非战争运用来形成的；战时，则通过实战为社会生产出国家安全（和平）产品——赢得战争胜利，创造新的和平安定的生活工作环境。三是军事产品是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的统一，是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统一。作为有形产品，军事产品的产出直接表现为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军事设施等为满足保卫国家安全（和平）需要的各种物质基础；作为无形产品，军事产品的产出则表现为军事科学技术、军人军事素质、作战理论和战法。有形产品与无形产品共同构成武装力量，通过对武装力量的使用形成终极产品——国家安全（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产品的产出则是无形产品和非物质产品。四是军事产品具有公共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因此可以说，中国国家安全（和平）产品的消费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而它是一种社会公共消费品。在这个意义上，军事生产是社会特殊公共消费品的生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生产的微观主体——企业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和平时期，这一特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军事生产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军品生产的微观主体在生产各个环节对于军品生产的监督和控制以及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而

国家安全 和平 产品作为一种公共消费品 其价值则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在现实中，这种社会效益很难以具体的价值或其表现形式——价格来衡量。这就形成了军事生产高消耗性、高质量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高附加值所要求的军品的高价格、企业以此为依据而所应当获得的高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 和平 生产不能直接以价格来衡量之间的矛盾。

（二）生产决策特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用产品生产的决策主要依赖市场的调节，而军事生产的决策则主要由党和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机构作出。这种决策的依据首先是国家安全（和平）的需要，其次才是经济效益问题。因此在现实运行中，企业没有直接的生产决策权，而只能根据国家的宏观决策来安排生产。在和平时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决策的特殊性对于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决策机构在决策时必须努力实现保障企业自身经济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利益的统一。在决策时，决策机构必须全面考虑武装力量结构、部署、装备发展、军事设施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军事生产发展决策。这些都是事关全局的宏观决策。

（三）运动过程特殊

社会经济的运动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再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这一具体过程的起点，并在四个环节中起着决定作用。军事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运动过程虽然也同样是由上述四个环节组成的，但却有着自身的特点。

1. 运动的起点不同。军事生产运动的起点，不是生产，而是分配，即开始于国家在财政分配时究竟拿出多少资源用于军事。在

现实中，这种分配的表现形式就是军费的分配。这是军事生产运行的前提。但仅有军费的初次分配还不够，还必须有军费的再次分配，即军费在各个军兵种之间的分配。只有完成了这两次分配，军事生产的运行才有可能。这种分配一旦中断，军事生产的运行也将随之中断。

2. 交换的范围不同。民品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换，而军品交换则有严格约束，购买的主体只能是武装集团，而决不允许在市场上随便出售。国际军贸空间更加受限，最先进军品一般不会售往另一国家，常规军品贸易也在数量、质量和国别、地区上带有诸多限制条件，选择余地很小。国家安全（和平）产品也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和贸易让步来获得。

3. 消费的性质不同。消费是一般民用经济的终结，也是军事运动的终结。但是，一般民用经济的消费既是消费也是生产，从而可以实现再生产。因此，民用经济的消费环节是生产与再生产的中间环节。而军事的消费则不同，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用于军事的消费，相当一部分不能转化为再生产，只能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被消耗掉的物质资料无论其实物形态还是其价值形态都不能靠军事自身来补偿。因此，从这个意义讲，军事的消费是一种最终消费。尽管军事的消费产出了国家安全（和平）而国家安全（和平）又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军事的消耗性。

二、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特殊性的一般表现

军事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运动，这也决定了军事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这两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用特殊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研究军事与经济互动的规律。

（一）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特殊性的内部表现

1. 周期性与骤需性的矛盾。所谓周期性，是指军事力量积聚需要一定的周期。从微观上讲，与一般民品不同，新型武器装备往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人类社会最高智慧、最强力量的凝结，富有极大的挑战性、探索性、曲折性，它从设计、论证、立项到科研、试验、定型、生产再到装备部队使用，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一种新型导弹和战机的诞生，完成整个过程，一般都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如，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1972年开始研制，至1991年海湾战争投入使用，前后经历了近30年。

所谓骤需性，是指战争爆发具有骤然性的特点，从战争预兆到战争爆发，往往间隔期限极短，不可能有很长的预警期，有时甚至因一个突发事件而导致战争。因此，一旦战争爆发，就会骤然动用强大军事力量来应对。

军事史上，由于对未来战争打法判断错误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事例很多，尤其是在军事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这个问题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战前夕，各主要国家的统帅部，对大战的预测有两点共同的错误：一是估计大战将是速决的，依靠战前储备的军用物资就够用了；二是大战将以进攻取胜，防御没有意义。结果大战一打起来，变成了持久战。由于消耗的空前巨大，头几个月就把平时的储备打光了。沙皇俄国军队最突出。战前规定每门76火炮全年的弹药为1000发，实践证明只够用16天。有时4个人用一支步枪，一个军有一两千人赤手空拳等着从战死者手中接管武器。有些胜利的进攻战役，因弹药供应不上，半途而废，白白损失了大批部队。各主要参战国都不得不实行史无前例的国民经济总动员，大幅度压缩民用生产，增加军工生产，这就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战争爆发变得越具突发性，消耗也越

来越大。因此，在相对和平时期人们不得不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解决未来战争军事需求迅速扩大的问题。1960年美国出版的C.J希奇和R.N·麦基因合著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有充裕的动员和准备时间的战争，以后不会再现。决定性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在热战开始之前把经济力量变为适用的军事力量。因此，主张平时就要保存必要的兵力和足够强大的军事工业，一旦战争爆发，不必通过动员就能够把平时建立的军事经济转变为保障军队作战的力量。事实上，《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为美国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美国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向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打破了武器的破坏力与工业的动员力之间的均衡状态，使人们对工业动员的作用，进而对战争动员的战略意义产生了怀疑。英国人认为，瞬间就能毁灭一切的核大战是十分短暂的，这种核战争不仅无须动员，也根本来不及动员。尽管核大战也会有一个短暂的预警期，但不足以用来进行战争动员。基辛格博士在他所著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也认为“在核时代，长期动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在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时候，不管表示或者甚至意图如何，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总是经常存在的。”“像二战那样依靠开战后动员的做法已经过时，核大战条件下更多将依靠现实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动员国家的战争潜力”；为应付短暂的核大战，平时就要使国家的各个方面进入动员状态。”苏联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动员在核大战中的作用，但所强调的也仅仅是动员在战争初期的作用。索科洛夫斯基在《军事战略》中讲到：“能在经济上保持军队拥有在战争初期对侵略者实施毁灭性突击的最大威力，是未来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根据国内外军事发展适应或违反周期性与骤需性矛盾规律的经验教训，推导出如下军费补偿公式：

$$S = (P + P^n)t$$

式中：

S——因不适当减少而需要弥补的军费的总量；

P——不适当减少的军费数量；

n——几何数（指数），根据军费减少总量及所造成军力削弱和滞后程度而定， $n > 0$ ；

t——时间 通常以年为单位。

式中 $P = F - H$

F——必要的军费需求量（F由国际经济、政治、科技、能源、外交等要素构成的总体发展变化趋势和国家战略、安全利益需求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状况等因素综合评估而定）；

H——实际军费供给量。

由上式可以看出，由于盲目削减军费，造成军事力量削弱，在日后形势逼迫不得不加以弥补时，除科学技术积累、人才培养保留等难以弥补的因素外，仅就经济因素而言，需要以原来削减军费量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经费才能加以弥补，并且削减军费量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弥补总量就越大。这里以三、四代战机和导弹为例，如果军费能够持续正常保障，本国能够研制生产出来，其初始装备军队的售价，只相当于进口价格的 60%~70%。随着大批量装备军队，将逐渐降低到进口价格的 50% 以下；如果再计算后续保障费用，其总体价格只相当于进口价格的 30%~40%。这还不包括军事工业对国民经济贡献而形成的价格折扣因素。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合理大幅削减军费，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反而会致使经济总量下降，甚至对军事和经济共同造成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因为，军事领域的国际竞争是一种激烈程度最高的竞争，并且是相互排他、相互封锁的竞争。军事上的落后比经济上的落后更难以追赶，往往差距会越来越大，需要重新获得机遇和花费更多的时间。所以，在军费实际

投入与必要需求差距太大、导致军事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如果只增加与前期所削减的军费相等量的经费，是无法弥补军事力量削弱的差距的，必须成倍、高额追加经费投入，同时还要经过较长历程的磨难，才能有所追赶、有所补救。

2. 可求性与受制性的矛盾。可求性，是指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借助外力，如，武器装备可向别的国家和地区购买。这样，可以缩短研制生产的周期，甚至弥补本国和地区的战略性短缺，在一定时期内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目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国际军火市场也在逐步扩大和开放。几乎所有国家的军事储备中，都有一定比例的武器装备来源于国际军火市场。

受制性，是与可求性相对的。在军火交易日益频繁、军力可求性越来越强的同时，国家间军事力量的相互牵制也越来越增强。特别是对一些军火上“外向型”的国家，向国外购买的军火越多，受制于人的程度就越高。一旦战争降临，这种用钞票随时可以换来的军力，瞬间就会变成套在脖子上的绳索，牢牢被异区他国所控制：不是武器装备使用不灵，就是缺少零配件，特别是弹药的持续供应根本无法保证。在英阿马岛战争上，阿根廷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伊战争中，伊拉克也因购买别国的武器吃尽了苦头。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老先生轻易相信了外来力量的作用，结果把一个国家带到了苦难的深渊。目前，中国军工发展的一定对外依存度和武器装备引进的现实状况也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前几年中国在以色列订购预警机因美国干预受挫，就是一次严肃警告。可以预见，如果不尽快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一旦发生战争，中国必将处于战略、战役被动局面，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是相当困难的。

军事力量发展的这种平时的可求性与战时的受制性之间的突

出矛盾，用无数生命和血的代价告诉我们，不论是经济强盛时期，还是相对弱势时期，都不能过分依赖于别国。在发展军事上如果也搞“外向型”则后患无穷。因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集中部分国力，促进军力的持续发展，并以军力的持续发展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特殊性的外部表现

军事与经济矛盾的特殊性的外部表现，实质是军事供给与武装力量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军工及有关部门生产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武装力量，是为武装力量提供消费品；而国家安全服务对象是社会全体公民，是国家。这就决定了军事与经济的矛盾必然有其特殊性。军事生产为武装力量提供所需的物质产品，因而它为武装力量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国家安全是军事生产的归宿和结果。因此，军事生产内含着武装力量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即武装力量消费所需军品的质和量，与军品供给的质和量的矛盾。从内在逻辑关系上看，两对矛盾是因果关系，前一对矛盾是因，后一对矛盾是果。也就是说，武装力量的消费得不到满足，武装力量就不可能保质保量地为社会和国家提供所需的国家安全产品，国家安全消费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满足，即武装力量就不能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利益，乃至政治、经济利益。具体地讲，军事与经济矛盾特殊性的外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负重性与无补性的矛盾。负重性，是指军事发展必然会给经济带来负担。而且，这种负担在一定时期内会很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无补性，则是指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一旦国家遭到敌对势力的攻击，整个经济将面临无法补救的危机。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国家的灭亡。因此，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家安全，就必须有军事；而军事的发展，必然要给

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这就是负重性与无补性的矛盾所在。

如何看待这一矛盾，是正确处理经济与军事关系的核心。要认识到军事对社会经济的负重性，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成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分配剩余价值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税收（以及依靠税收形成的军事力量）和利息、地租一样，都是经济发展中必需的成本。如果没有这种成本，国将不国，经济也难以发展，就会使国家和经济面临无补性的后果。

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度，来化解这一矛盾。按照即时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我们希望国家不要承担军事费用；但按照长远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则我们不能不承担一定的军事费用；如果按照政治效益最大化原则，有些政治家甚至选择把大部分经济力量投入到军事建设中去，如希特勒。如何在这三种选择中，选取一个适当的量，来处理军事投入（成本）与战争损失（风险）的关系，处理好平时的负重与战争带来的不可弥补性损失这一矛盾，确保国家有足够、长远、根本的利益，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下图中 Y 表示国家经济；X 表示国家安全；P 表示起始点；A 表示军事投入与 GDP 交汇的最佳度，中间线值为最大值。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在军事投入占 GDP 比重趋于最佳度时，国家经济、国家安全利益才取得最大值；随着这一比例不合理扩大而使国家经济、国家安全利益共同取值不断缩小；当走向极端时，取值为零，即当所有的经济都投入到军事建设时，国家经济利益为零；当国家在军事上不投一分钱时，国家安全利益为零。当其中任何一方为零时，都最终会使另一方也为零。因此，处理好经济与军事的关系，解决负重性与无补性的矛盾，关键在于寻找 A 这一最佳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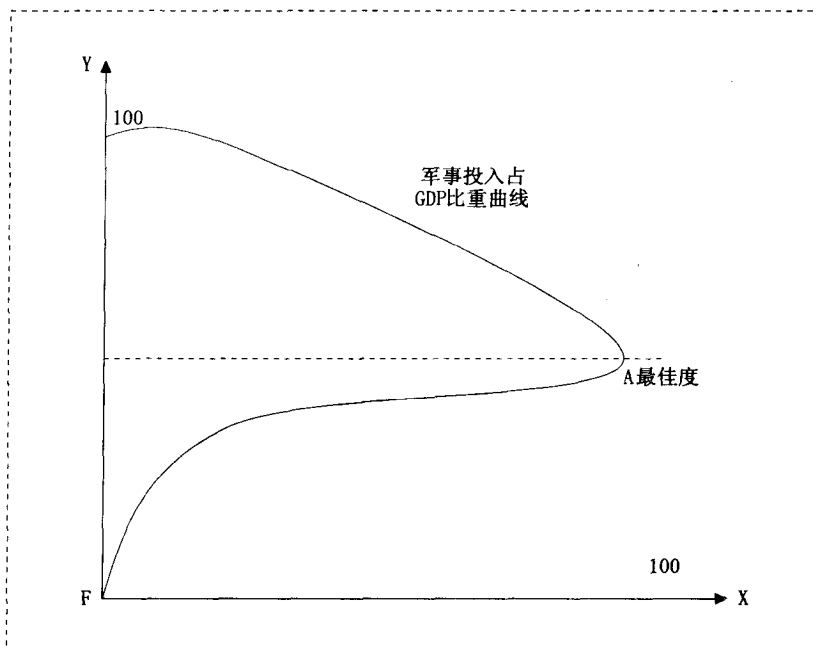


图 1-1 军事投入占 GDP 比变化对国家经济、国家安全影响趋势图

2. 高耗性与外依性的矛盾。高耗性是指军事对资源占有、消耗的量。军力强弱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一般情况下，军事投入越大对资源占有越多，军力就越得到增强。既定的资源用于了军事，其大部分就不能再用于经济，两者不能完全兼得；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军事占有资源多了，配置给经济的资源就会减少。事实上，世界各国军事对资源的消耗是相当大的，因而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加剧了资源的国际竞争。这就是军事对资源的高耗性。这种高耗性，如果用非战争因素来评估，是显而易见的。

外依性是指经济发展对外来资源、市场具有某种程度的依存性。而这种对外依存的可靠性又需要强大军力来支撑。事实证明，一国军力越强，掌控资源的量就越多，进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越大。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形势下，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种对资源占有能力的竞

争。一国如果没有足够的军力去维持其国际地位，扩大影响力、威慑力，外来资源就很难输入，甚至彻底断流，即使勉强维持强势国家允许范围内的流入量，其引进的成本和代价也是十分惊人和难以承受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竞争只能一天比一天激烈、尖锐、残酷。争夺资源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需的能源等战略资源 将是未来战争爆发的核心因素。因此 国家资源（能源）通道安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可以说，没有资源（能源）通道安全，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而要确保国家资源（能源）通道的安全，就需要维持军事的高投入高耗性，以求军事实力的强大，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对世界市场和资源（能源）依赖的可靠性。

从长远来说，地球上的石油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类对石油的消费需求却绵延不断，永无止境，总有一天会达到石油资源耗尽的地步。现在已经探明的全世界石油储藏量大概为 1.15 万亿桶。以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地球上的石油储量只够满足全世界石油消费需求 50~60 年。据美国能源部门估计，世界石油储藏量主要分布在中东、拉美、欧洲、非洲、亚洲与北美。按储量大小计算，排前 10 位的依次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伊朗、委内瑞拉、阿联酋、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墨西哥、美国和中国。今后 20 年内，世界石油还能供求平衡，但 20 年后就会逐年加重缺油的局势，并越来越接近油源枯竭的日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靠使用能源来维持的，而石油在未来数十年内仍将是世界头等能源的来源。石油已成为一种被誉为“黑金”的稀有的战略物资。石油储备是世界经济特别是工业国家的中枢神经。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石油价格有关。油价下降 1% 相当于美国国民收入增长 10 亿美元。

进入 21 世纪，中国开始步入能源消耗大国行列。2004 年，中国石油日均消耗 660 万桶，比上年增加了 11%，约为美国耗油量的

三分之一，排在世界第二位。据专家预测，2025年中国将达到美国现在的石油消耗量。目前，中国的石油储量已到了一个非常缺乏的状况。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3年的34.5%。2004年中国石油消耗近2.95亿吨，其中国产1.75亿吨，进口近1.2亿吨，对外依存度为40.5%，预计2005年石油消耗3.1亿吨，其中国产1.8亿吨，进口将达1.3亿多吨，对外依存度达43%以上。到2010年和2020年，石油进口将分别达到1.6亿吨和2.5亿吨，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50%和58%。而目前中国的能耗相对较高，今后这种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善，但能耗仍将维持一个不低的水平。因此，能源进口的保障及其价格变动，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将产生直接影响。据有关部门测算，国际油价每桶变动1美元，将影响中国进口费用46亿元(人民币)，直接影响GDP增长0.043%。2004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猛涨。纽约原油价格在2004年7月初为每桶38美元，而10月初就冲破50美元大关，与一年前相比，涨幅达一倍，达到21年来的最高峰。此后，纽约油价一直在每桶50~60美元之间的高位徘徊。2005年8月12日，纽约油价达每桶66.86美元，再创历史新高。预计2010年前将可能达到每桶100美元左右。这对石油外依度长期高达40%~50%以上的中国来讲，显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部门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国家综合利益乃至生存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再过一二十年，中国将面临多种稀缺资源的进口。这种资源、能源的缺乏需要在消耗上有所控制，包括发展军事在内的诸多行业，以维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但也要看到，中国在以能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对外需求上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对外来资源、能源的足够需求和依托，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和制约，甚至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

因此，面对军事发展一方面消耗资源、能源，另一方面有利于